

咸陽成任東漢墓出土金銅佛像再論*

張利明

浙江大學

摘 要：2021 年咸陽成任村東漢墓出土了兩件小型金銅佛像，發掘團隊認為其年代在東漢晚期，是目前中國考古出土年代最早的獨立金銅佛像，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但因該墓曾被盜掘，對這兩件佛像的認識甫一公佈就產生了巨大分歧。分歧的核心聚焦在佛像的年代上，主要形成了“東漢晚期”和“十六國”兩種觀點。本文利用此前很少被注意到的造像特徵和材料，將這兩件佛像置於關隴地區小型金銅佛像系統內部來討論，提出了第三種觀點。認為二者的製造年代並不相同，立佛像製造於十六國末期，片狀五佛造像約製作於北魏孝文帝延興至太和初期。二者的造像樣式、組合形式和題材等並不特殊，常見於十六國晚期至北魏中期關隴地區小型金銅佛像中。

關鍵詞：金銅佛像、關隴地區、十六國、北魏、犍陀羅

2021年5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陽洪瀆原成任村一處東漢(25-220)家族墓(編號為21XJM3014-3020)中發掘出了兩件小型金銅佛像(M3015墓室出土),分別為一件施無畏印立佛像(圖1)和一件片狀的五佛坐像(圖2)。此外,相近的M3019墓室出土了帶有東漢延熹元年(158)朱書紀年的陶罐,為這處家族墓的斷代提供了可靠依據。發掘團隊經綜合研判,認為這是目前國內考古出土的時代最早的金銅佛像,系本土製作的具有犍陀羅風格的金銅佛像,對於佛教文化的傳入及中國化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¹。

這兩件佛像的學術價值不言而喻,一經發佈便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²。該家族墓的發掘簡報和這兩件

*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犍陀羅與中國文明交流史(多卷本)”(專案號:20 & ZD220)階段性成果。英文本發表為:Liming Zhang, “Re-Study of the Gilt Bronze Buddha Statuettes Unearthed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mb in Chengren Village, Xianyang City, China”. *Religions* 15, no. 12 (2024): 1476. <https://doi.org/10.3390/rel15121476>, 此中文本略有修改。本文脫胎於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感謝導師孫英剛教授的悉心指導以及諸位答辯委員和匿名評審專家的寶貴意見。

¹ 2021年12月9日,陝西省文物局舉行了新聞發佈會,《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陝西日報》等眾多媒體都刊登了這一消息,內容基本一致。詳見《陝西咸陽出土國內最早金銅佛像》,《光明日報》2021年12月10日09版。

² 比如2021年12月26日,四川師範大學藝術研究院主辦了題為“咸陽新出土金銅佛像考古發現”的學術對談,部分學者對造像的年代等問題提出了質疑。這次新發現還引起了學術界以外的廣泛關注,2022年12月30日陽新在微信公眾號“太陽很大古美術”上發表了《關於咸陽東漢墓出土銅佛的年代分析》一文,將這兩件造像與中國現存的早期佛教造像進行了詳細地比較研究,認為這兩件佛像是後期混入墓葬的,屬於十六國時期。詳見https://mp.weixin.qq.com/s/U_68mWkaGxnNnVbTk3wPAA (2024年12月1日訪問)。另一方面,2022年2月25-26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主辦了題為“發現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的工作坊,來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香港中文大學、芝加哥大學、耶魯大學等多個研究機構和高校的十餘位學者進行了公開的線上學術研討,使之成為國際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與會學者也並未對這兩件金銅佛像的年代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詳見雷潔整理《發現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考古的推斷》,《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2年3月6日,網址: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73851 (2024年12月1日訪問);雷潔整理《發現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佛教史的諸問題》,《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2年3月26日,網址: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295519 (2024年12月1日訪問)。



圖 1：成任東漢墓 M3015 出土立佛像
(採自《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第 2 頁，圖版 1)



圖 2：成任東漢墓 M3015 出土片狀五佛坐像
(採自《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第 2 頁，圖版 2)

佛像的初步研究與科學分析結果也被迅速發表出來³。但由於M3015墓室曾被盜掘過，自公佈之日起，學界對這兩件佛像的認識就產生了巨大分歧。分歧的核心聚焦在佛像的年代上，主要形成了“東漢晚期”和“十六國”兩種觀點。儘管不斷有新的研究成果問世，但分歧似乎並未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可以說，關於這兩件金銅佛像的基礎問題尚未解決，與之相關的討論仍是非常開放的學術議題。本文利用此前很少被注意到的造像特徵和材料，將這兩件佛像置於關隴地區小型金銅佛像系統內部來討論，提出了第三種觀點。筆者認為咸陽成任東漢墓出土的兩尊佛像製造年代並不相同，立佛像製造於十六國(304-439)末期，片狀五佛造像約製作於北魏孝文帝(467-499, 471-499在位)延興(471-476)至太和(477-499)初期。

一、研究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目前，對咸陽成任東漢墓出土的這兩件佛像的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相關議題也十分廣泛，涉及佛像的年代、產地、製造工藝、造像特徵、藝術風格、文化來源、功用、信仰人群及信仰形態等一系列議題。比如，最先對這兩件佛像進行專門研究的冉萬里、李明等學者就從九個方面進行了詳細論述⁴。在所有議題中，最根本、最重要的當屬佛像的年代問題，這也是學界關於這兩件佛像產生分歧的核心所在，目前主要有“東漢晚期”和“十六國時期”

³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2年第1期，第3-27頁；冉萬里、李明、趙占銳《咸陽成任墓地出土東漢金銅佛像研究》，《考古與文物》2022年第1期，第82-94頁；李建西等《咸陽成任墓地出土東漢金銅佛像科學分析》，《考古與文物》2022年第1期，第123-128頁。

⁴ 前揭冉萬里、李明、趙占銳《咸陽成任墓地出土東漢金銅佛像研究》，第82-94頁。

兩種觀點。

佛像年代問題至關重要，是討論其他議題的基礎。換言之，如果研究所依據的年代基礎出現較大偏差或被推翻，那麼對其他相關議題的討論將無所依憑、失去意義。例如，祇有在這兩件佛像早至東漢晚期這一推論成立的情況下，進而探討牠們“是否為獨立供養的佛像”“是否為中國本土製造”以及對“佛教傳入中國路線的再探討”“中國早期金銅佛像發展序列的重新審視”“東漢時期佛教信仰人群的再考察”等議題纔有必要或較大的意義。因此，佛像的年代是決定性的問題，亦是相關研究不可回避的首要問題。

關於佛像年代的分歧。冉萬里和發掘團隊最先提出了製作於“東漢晚期”的觀點⁵。在後續公開發表的報導和文章中，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李旻、Robert L. Brown、黃春和、崔夢澤等學者也持這一觀點，祇是論述的詳略程度和一些具體方面有所差異。比如，羅泰認為：“目前要考慮的是以前的藝術史排隊可能是基於錯誤風格的認識。”⁶黃春和認為：“這兩件佛像的宗教意義和價值與當時我國西南墓葬出土的大量佛像一樣，祇是作為一般祭祀的神靈，稱不上獨立的、體現宗教信仰意義的佛像。”⁷崔夢澤的文章是目前最新刊布的研究成果，但她並未討論佛像的年代問題，而是直接在“東漢晚期”說的基礎上進行討論⁸。在年

⁵ 前揭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第27頁；冉萬里、李明、趙占銳《咸陽成任墓地出土東漢金銅佛像研究》，第82-94頁。

⁶ 前揭雷潔整理《發現中國最早的金銅佛像——考古的推斷》，《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2年3月6日。

⁷ 黃春和《咸陽成任墓出土佛像的年代產地及相關問題初探》，《收藏家》2022年第11期，第47-56頁。

⁸ 崔夢澤《新出西安咸陽成任墓東漢金銅佛像研究》，《宗教學研究》2024年第2期，第73-76頁。

代問題仍有巨大分歧的情況下，這樣的研究存在很大風險。

在專業性很強的佛教考古與佛教藝術學界之外，這兩件佛像還引起了媒體和社會大眾的廣泛關注。在這些群體中，“東漢晚期”說的影響力更大，佔據絕對主流。如前所述，自公佈之日起，《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等國家級媒體就以“國內最早金銅佛像”為核心觀點進行了報導。2022年6月10日起，漢景帝陽陵博物院舉辦了為期3個月的“梵相東成：陝西咸陽成任村東漢金銅佛像特展”，並配合直播和講座向社會公眾宣傳普及。最近出版的《文明中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闡釋》等通識性著作中也採納了“東漢晚期”的觀點⁹。

“東漢晚期”的觀點甫一出現，就有研究者提出了“十六國時期”的觀點。陽新率先在微信公眾號上發佈長文作了詳細論述¹⁰，其後姚崇新、朱滄、李雯雯，以及何志國等學者亦公開發文論證這一觀點。陽新和姚崇新均認為這兩件佛像是後期墓室被盜時混入的。姚崇新還對這兩件佛像的性質和進入墓葬的原因作了具體分析，認為可能是盜墓者不慎遺落在墓中的可攜式微型佛像，具有護身符的性質。此外，他還通過梳理懸泉東漢“小浮屠里”簡及漢文傳世文獻，認為即便這兩件佛像屬於東漢晚期，也不是年代最早的獨立佛像，也不是年代最早的金銅佛像¹¹。李雯雯和朱滄側重於佛像風格分析，認為立像明顯具有貴霜時期的犍陀羅、秣菟羅，以及笈多時期的秣菟羅這三種風格，並且不同意這兩件佛像是由盜墓者遺落在墓中的觀點，認為是通過二次葬或多次利

⁹ 中國歷史研究院編著《文明中國：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學闡釋》，北京：文物出版社，2024年，第201-202頁。

¹⁰ 前揭陽新《關於咸陽東漢墓出土銅佛的年代分析》。

¹¹ 姚崇新《關於咸陽成任東漢墓出土金銅佛像的幾個問題》，《文博學刊》2022年第2期，第17-29頁。

用進入墓室的¹²。何志國則進行了更加詳細的特徵分析和比較研究，在佛像混入墓葬的具體原因上持謹慎態度，未給出明確意見¹³。

上述持“十六國時期”說的研究者都舉證了兩個重要的核心論據。其一，都舉證了20世紀50年代石家莊北宋村一座被盜東漢墓的亂磚中出土過2件小型金銅佛像的先例¹⁴，以此來論證成任東漢基金銅佛像被後期混入墓室的可能性。其二，是在佛像形制、藝術風格的比較研究中，都舉證了一件日本私人收藏的、與M3015墓室出土立佛像極為相似的青銅立像¹⁵。既往的研究認為上述三件佛像都屬於十六國時期。但對於持“東漢晚期”說的學者而言，上述兩個例證並非無懈可擊。持“東漢晚期”說的學者可能會認為此前對這些小型金銅佛像的分期斷代出現了偏差，應該重新審視，成任東漢基金銅佛像的發現反而起到了對既往結論的糾偏作用。客觀來講，這兩條論據確實不夠充足，尤其是日本私人收藏的那件青銅立佛像。它是成任立佛像以外的一個孤例，目前已不知所蹤，其本身的出土地、流傳過程也不明確；其本身尚且有待研究，以其作為證據有很大的局限性。

從方法論層面來看。持“東漢晚期”和“十六國時期”說的研究者，幾乎都無差別地使用了三種主要的研究方法。一是通過遺跡現象判斷佛像與墓葬的相對年代關係，即判斷佛像是原始隨

¹² 李雯雯、朱濤《咸陽成任墓地出土金銅佛像風格研究》，《中國美術研究》2022年第3期，第184-191頁。

¹³ 何志國《咸陽出土“東漢青銅佛像”獻疑》，《中原文物》2023年第6期，第122-131頁。

¹⁴ 詳見孫德海、程明遠、陳惠《石家莊市北宋村清理了兩座漢墓》，《文物》1959年第1期，第55頁。

¹⁵ 日本私人收藏之青銅立像，見 Marylin Martin Rhie, *Early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 Vol. 2, The Eastern Chin and Sixteen Kingdoms Period in China and Tumshuk, Kucha and Karashahr in Central Asia (2 vols)*, 424-425, fig. 2. 67 (Leiden: Brill, 2002).

葬品還是後期混入墓葬的。在 M3015 墓室曾被盜掘的事實基礎上，對佛像與墓葬年代關係的判斷很大程度上祇能基於邏輯推理，但遺憾的是，無論持何種觀點的研究者都無法令對方完全信服。即使是在持“十六國時期”說的學者之間，對佛像混入墓葬具體方式的推測也眾說紛紜。歷史往往有很多偶然和不確定性，在沒有實質性證據的情況下，僅憑邏輯推理很難觸及到歷史真相。在目前的條件下，不必對這個問題過度糾纏，否則容易陷入自說自話或各說各話的無謂爭論中。即使不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會從根本上阻礙對佛像年代的判斷。

二是通過對佛像形制特徵、藝術風格、題材組合等方面的比較研究來判定年代。在比較對象的選取上也基本一致，主要選取了貴霜王朝時期犍陀羅和秣菟羅風格的石雕佛教造像、中國西南和江南地區漢晉時期墓葬中出土的佛像、中國中原北方地區迄於十六國時期的小型金銅佛像。但由於研究者的主觀性以及出發點的不同，對造像特徵的分析、對比較對象側重點的選取產生了很大差別，出現了利用同樣的材料和研究方法卻得出不同結論的有趣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研究方法的適用範圍和效力邊界有關。在一定範圍內，文化因素的比較研究無疑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當比較對象的時空跨度過大，材質、體量、功用和使用人群等差異顯著時，比較研究就會存在較大的主觀闡釋空間，說服力往往十分有限。以目前將這兩件佛像與犍陀羅、秣菟羅佛像的比較研究為例，這種大範圍的跨時空比較充其量祇能論證東漢晚期中國能夠出現單體佛教造像的可能性，並不能斷定這兩件金銅佛像的具體年代。因此，在比較研究中，比較對象的選取至關重要。一般而言，比較對象的時空範圍越接近，材質、體量、功用等越趨同，得出的結論也就越可靠。

三是利用自然科學，對這兩件佛像進行檢測分析。金屬與有

機質材料不同，科技檢測對於解決這兩件佛像的製造工藝和產地或許會有一定作用，但對於直接判定佛像的年代助益不大。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此前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兩個至關重要的年代學問題。其一，佛像的製造年代一定早於其進入墓葬的年代。已經有學者通過佛像的磨損痕跡說明這兩件佛像曾被長期使用過¹⁶。因此，如果佛像不是後期混入的，那墓葬的年代祇能作為佛像年代的下限；至於佛像進入墓葬前使用過多長時間，則不得而知。如果是後期混入的，即便佛像的製作年代如學者們推測的都在十六國時期，那這個年代也祇能作為佛像進入墓葬的年代上限，並不一定就是此前學者們認為的是十六國時期遺落在墓室內的¹⁷。

其二，要考慮這兩件佛像的年代是否相同？儘管二者同出一處，但畢竟是兩個獨立的個體。目前的研究都有意無意地將祂們視為同一時期的遺存，但二者在題材、造像特徵、藝術風格、合金成分等方面都有顯著差異。這些差異會不會是因年代不同造成的？畢竟在考古發現中，同一墓葬或佛像窖藏中同出器物年代不同的情況非常普遍。根據考古年代學的基本原則，較晚的那件佛像的年代可以作為這兩件佛像進入墓葬的年代上限。總之，對成任墓這兩件金銅佛像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分別考慮。

二、成任墓立佛像的年代及相關問題

在成任村 M3015 墓室出土的這兩件佛像中，立佛像保存較好，各部分的造像特徵較為清晰，是研究者關注和討論較多的一件。

¹⁶ 前揭姚崇新《關於咸陽成任東漢墓出土金銅佛像的幾個問題》，第 18 頁。

¹⁷ 前揭姚崇新《關於咸陽成任東漢墓出土金銅佛像的幾個問題》，第 29 頁。

如前所述，學者們已經對這件佛像進行了大量的比較研究，但由於著眼點的不同和比較對象固有的局限性，得出了極具差異化的結論。就目前的研究程度而言，從面相、袈裟、手勢等特徵入手，似乎很難再有實質性突破。幸運的是，筆者發現成任墓立佛像覆蓮臺座上蓮瓣的形態富有特色，可以為解決這件立佛像的年代問題提供重要突破口。

成任墓立佛像覆蓮臺座上蓮瓣的特徵是：花瓣肥厚，正中有一條縱向凸起的葉脈；最寬處在中間偏後部，逐漸向兩端呈弧形收縮，末端中間內凹，前端中間突出；花瓣的長度略大於寬度（圖 3b）。既往研究者在比較研究後，認為其與涇川玉都鄉出土禪定金銅佛像背屏和傘蓋上的蓮瓣紋一致或相似¹⁸。實際上，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蓮瓣紋樣。涇川玉都像上蓮瓣的最寬處不在後端而是在前端，向後平直收縮；花瓣長度遠大於寬度，整體顯得縱長（圖 3a）；除正中也有一條縱向凸起的葉脈外，其他方面與成任立佛像蓮瓣的形狀完全不同。

成任立佛像上蓮瓣的形狀與犍陀羅佛教藝術中非常流行的菩提葉如出一轍（圖 4）。在犍陀羅，這種形狀的菩提葉不僅作為邊飾圖案被頻繁地雕刻在佛塔、佛寺階梯的浮雕石板上，還被大量雕刻在佛傳故事的特定場景內。例如，釋迦苦行、降魔成道、四天王奉鉢、梵天勸請、走向菩提座（圖 4a）等佛傳圖像中都有大量表現。相關圖像非常豐富，不勝枚舉¹⁹。

在中國，小型金銅佛像上這種菩提葉狀的蓮瓣紋也並非個

¹⁸ 前揭陽新《關於咸陽東漢墓出土銅佛的年代分析》；何志國《咸陽出土“東漢青銅佛像”獻疑》，第 124-125 頁。

¹⁹ 僅栗田功編著的圖錄中就有大量相關像例，詳見栗田功編著《ガンゲーラ美術Ⅰ・佛伝》，東京：二玄社，1988 年，第 31、51-52、59、74、76、78、97、110-113、116-117、119、122、125-128、213、254-255 頁。



圖 3: 成任立佛像覆蓮座蓮瓣與涇川玉都像蓮瓣比較示意圖 (筆者製作)
(a. 涇川縣博物館提供; b. 採自《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 第 2 頁, 圖版 1)



圖 4: 成任立佛像覆蓮座蓮瓣與犍陀羅菩提葉比較示意圖 (筆者製作)
(a. 採自美國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官網; b. 採自《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 第 2 頁, 圖版 1)



圖 5: 成任立佛像覆蓮座與故宮 21 號像覆蓮座比較示意圖 (筆者製作)
(a. 採自李靜傑主編《中國金銅佛》，第 40 頁，圖版 21；b. 採自《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第 2 頁，圖版 1)

例。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帶有覆蓮臺座的小型金銅彌勒菩薩立像，通高 9.9 釐米，20 世紀 60 年代初於西安購藏，《中國金銅佛》一書將其編為 21 號像 (以下稱故宮 21 號像) (圖 5a)²⁰。該像覆蓮座上的蓮瓣也為菩提葉狀，與成任立佛像覆蓮座上的幾乎完全一致 (圖 5)。

²⁰ 李靜傑《金銅佛的文獻考察》，《故宮博物院院刊》1995 年第 1 期，第 51-53 頁；又見李靜傑主編《中國金銅佛》，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年，第 40、229 頁。



圖 6: 成任立佛像覆蓮座蓮瓣與大夏勝光二年像蓮瓣比較示意圖 (筆者製作)
(a. 採自羅世平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宗教雕塑 1》, 第 40 頁; b. 採自《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 第 2 頁, 圖版 1)

此外, 著名的大夏勝光二年 (429) 中書舍人施文造像雙獅座的中央也鑄造有相同的菩提葉狀蓮瓣 (圖 6)。勝光二年是赫連定 (?-432) 的年號, 其時統萬城已陷落, 赫連定奔逃於隴東的平涼²¹。造像者施文為“中書舍人”, 是親隨君主的近臣。該像應流行於平涼一帶的隴東地區, 與上述兩像的地點接近, 同屬關隴文化區。

同樣的菩提葉狀蓮瓣還大量出現在關隴地區以外的中國早期小型禪定金銅佛像上, 比如河北易縣西貫城出土 (圖 7a)、鄭州博

²¹ 黃文昆《中國早期佛教美術考古泛議》,《敦煌研究》2015 年第 1 期, 第 6 頁。



a. 易縣西貫城出土



b. 鄭州博物館藏



c. 臺北故宮博物館藏



d. 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

圖 7: 雙獅座中央鑄有菩提葉狀蓮瓣的小型禪定金銅佛像(筆者製作)
(a、b. 採自浙江省博物館編《佛影靈奇：十六國至五代佛教金銅造像》，圖版 8、12；c. 採自臺北故宮博物院編《歷代金銅佛造像特展圖錄》，第 19 頁，圖版 1；d. 採自金申主編《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圖版 5)

物館收藏(圖 7b), 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圖 7c)、美國納爾遜博物館(圖 7d)和日本出光美術館等處收藏的小型禪定金銅佛像上的雙獅座中央也都鑄有同樣的菩提葉狀蓮瓣紋。不僅如此, 這些佛像在身姿、袈裟樣式、衣紋、袖擺、插樺、雙獅形態等方面也高度一致, 屬於中國早期小型禪定金銅佛像演變序列的同一個階段²²。以大夏勝光二年作為年代參照, 可知這種菩提葉狀的蓮瓣是關隴地區乃至整個中原北方地區十六國晚期小型金銅佛像上普遍流行的一種蓮瓣紋樣。

筆者目力所及, 尚未在中國早期小型金銅佛像以外的其他中國佛教造像中看到成系統出現的菩提葉狀蓮瓣紋。在中國早期小型禪定金銅佛像自身的演變序列中, 蓮瓣紋作為一個重要的組成要素, 也表現出很強的階段性特徵。以早於大夏勝光二年像的泰常五年(420)像為尺規, 該像出土於隆化縣四道營鄉, 是中國早期小型禪定金銅佛像演變序列中另一件自帶紀年的標準像(圖 8)。與該像屬於同一階段的小型禪定金銅佛像有石家莊北宋村 2 號像、保定土產經理部揀選像、故宮博物院 4 號像、涇川玉都像等²³。這一階段流行的蓮瓣紋在形態上也高度一致, 處於菩提葉狀蓮瓣紋的前一階段。以保存較為完整的涇川玉都像和石家莊北宋村 2 號像(圖 9)為例, 蓮瓣紋大量鑄刻在造像的背屏、傘蓋、趺坐以及插掛在背屏上的微型禪定坐佛像或菩薩像臺座上。保定土產經理部揀選像頂部小佛像的蓮花座也是同樣形態的蓮瓣(圖 10)。

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小型禪定金銅佛像上同時保存了這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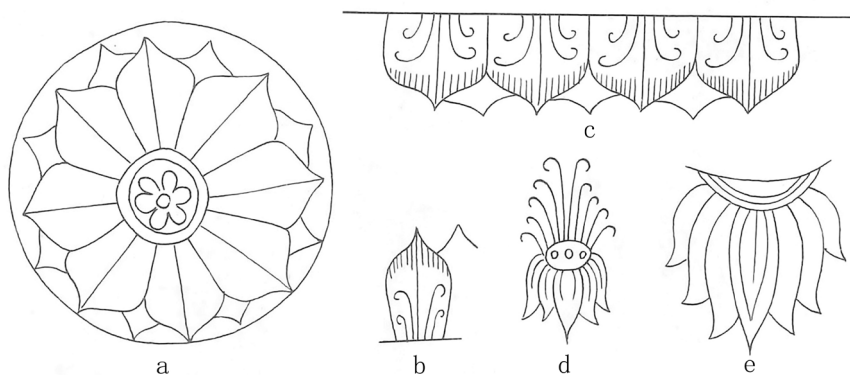
²² 張利明《漢晉中國與貴霜文明——以出土材料為中心》, 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24 年, 第 49-58 頁。

²³ 劉建華《北魏泰常五年彌勒銅佛像及相關問題的探討》, 收入《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第 377-382、385-387 頁。



圖 8: 北魏泰常五年像

(採自浙江省博物館編《佛影靈奇：十六國至五代佛教金銅造像》，圖版 20)



a. 傘蓋蓮瓣 b. 背光蓮瓣 c. 佛座蓮瓣 d. 弟子像上方蓮瓣 e. 雙獅座中央蓮瓣

圖 9: 石家莊北宋村 2 號禪定像花瓣紋示意圖 (a-e 皆採自劉建華《北魏泰常五年彌勒銅佛像及相關問題的探討》，第 380 頁，圖 9)



圖 10: 保定土產經理部揀選像
(採自浙江省博物館編《佛影靈奇：十六國至五代佛教金銅造像》，第 40 頁，圖版 7)

個階段的蓮瓣紋，展現了蓮瓣紋樣的過渡：佛像雙獅座中央和背屏上化佛覆蓮座的蓮瓣為菩提葉狀，趺坐兩側菩薩立像覆蓮座的蓮瓣則表現為上一階段的形態（圖 11）。此外，從涇川玉都像雙獅座中央的蓮瓣紋上也可以看出明顯的過渡狀態。其以鑄刻結合的方式一方面延續了同一階段中稍早的以石家莊北宋村 2 號像為代表的線刻細長形花瓣紋組合的基本樣式（圖 9e），另一方面也已經



圖 11: 日本出光美術館藏禪定金銅佛像
(採自金申編《海外及港臺藏歷代佛像珍品紀年圖鑒》，第 388 頁)

初步具備了下一階段中菩提葉狀蓮瓣的基本形態，祇是在輪廓上仍比較狹長（圖 12）。由於這兩件佛像都沒有紀年，可以退一步將同期造像中略早的泰常五年（420）像²⁴作為判定小型金銅佛像中菩提葉狀蓮瓣紋出現的年代上限。

最後，討論中原北方地區小型金銅佛像上菩提葉狀蓮瓣流行

²⁴ 前揭劉建華《北魏泰常五年彌勒銅佛像及相關問題的探討》，第 386 頁。



a.石家莊北宋村2號像

b.涇川玉都像

c.大夏勝光二年像

圖 12: 雙獅座中央蓮瓣紋演變示意圖 (筆者製作)
(a. 採自羅世平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宗教雕塑 1》, 第 41 頁; b. 筆者拍攝; c. 採自羅世平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宗教雕塑 1》, 第 40 頁)



圖 13: 太平真君四年苑申造像及覆蓮座蓮瓣細部 (筆者製作)
(採自金申編《海外及港臺藏歷代佛像珍品紀年圖鑒》, 第 390 頁)

的年代下限。西元 439 年，北魏統一中原北方地區，為中國北方佛教的發展帶來了重大變化。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²⁵”與之相應，佛教藝術也發生了重要變化。上述以今河北為中心的早期小型金銅佛像不再流行，而在這一地區現存北魏統一之初太平真君 (440-451) 年間的佛像上出現大量新的變化²⁶。佛教造像的蓮瓣紋樣即是重要變化之一，摒棄了 429 年前後十分流行的菩提葉狀蓮瓣，出現了新式蓮瓣紋。新式蓮瓣紋最明顯的特徵是蓮瓣從中央分為左右兩部分，每部分都有一個腰豆狀的凸起。比如太平真君元年 (440) 朱雄造像、太平真君四年 (443) 苑申造像 (圖 13)、太平真君五年 (444) 朱業微造像等臺座上的蓮瓣皆表現為這種新樣式；而且其流行期很長，一直到北魏滅亡都是中原北方地區佛教造像中最主要的蓮瓣樣式。反觀十六國末期曾短暫流行的菩提葉狀蓮瓣，則沒有再出現過。因此，可將 439 年這一中國佛教史和佛教藝術上重要的時間節點作為中原北方地區小型金銅佛像上菩提葉狀蓮瓣紋流行的年代下限。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成任立佛像應當製作於西元 5 世紀初的十六國末期。

三、成任墓五佛造像的年代及相關問題

成任村 M3015 墓室出土片狀五佛造像上的五身坐佛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壞，但將它們各自殘留的清晰部分組合起來就可以大致復原出佛像的完整面貌。佛像面相長圓，施禪定印坐於桃尖形背屏之前。右下方佛像右臂上的衣紋明顯，可知其著通肩式袈裟 (圖

²⁵ (北齊) 魏收《魏書》卷 114〈釋老志〉，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 3032 頁。

²⁶ 前揭劉建華《北魏泰常五年彌勒銅佛像及相關問題的探討》，第 383-384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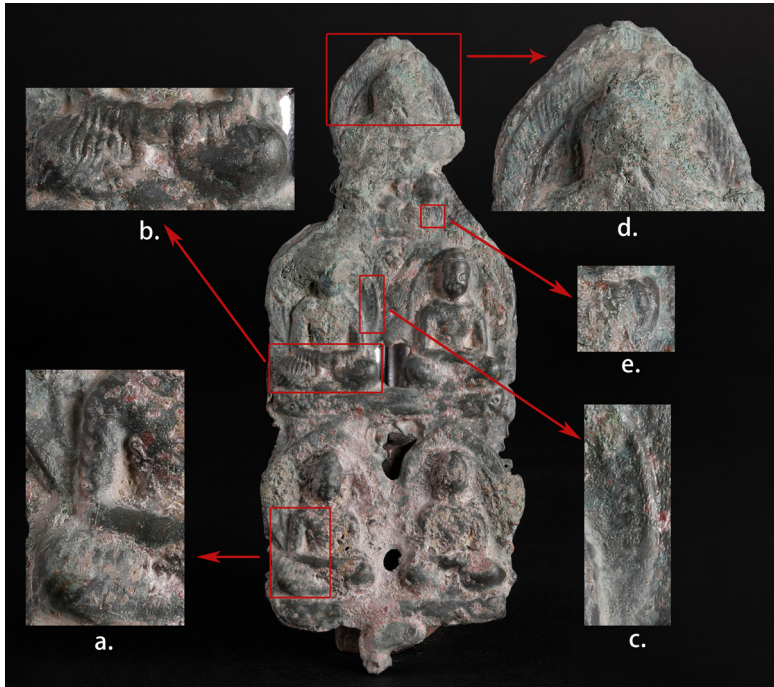


圖 14: 成任片狀五佛像佛像細部圖 (筆者製作)
(底圖採自《陝西咸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第 2 頁，圖版 2)



圖 15: 靈臺片狀九佛造像及佛像細部圖 (筆者製作)
(靈台縣博物館提供)

14a)。第二排右側佛像的袖擺完整，衣紋基本清晰，對稱地平覆於雙膝之上（圖 14b），此像背光左側還保留有清晰的帶狀聯珠紋（圖 14c）。最上方佛像背光右側也保存有相同的帶狀聯珠紋，背屏外緣為清晰的平行放射狀火焰紋（圖 14d）；該像左膝正下方還殘存有一片較為清晰的臺座花瓣，花瓣樣式為上節所述北魏統一之後中原北方地區普遍流行的樣式（圖 14e）。因此，僅憑花瓣紋這一點就可以推翻五佛造像年代的“東漢晚期”說，而且還可以判定成任墓五佛造像與立佛像的相對年代，即五佛造像要晚於立佛像。

在關隴地區與片狀五佛造像上佛像樣式相同的佛像並不在少數。靈臺縣博物館收藏有一件組合形式特殊的片狀九佛造像（圖 15）。該像保存完好，九身佛像的形象相同，而且與 M3015 五佛造像上佛像的形象高度一致。需要強調的是，這種一致不是個別造像因素的一致，而是全方位的一致。從佛像的面相、身姿到雙臂衣紋、袖擺的形態紋路、手印的細節表現再到背屏的形狀、背屏上帶狀聯珠紋和平行放射狀火焰紋裝飾的位置與形態，以及臺座上蓮瓣的形態都高度一致。

靈臺縣博物館這件九佛造像通高 18.5 釐米，單尊像皆高約 4.9 釐米，與五佛造像上單尊佛像的尺寸也一致。該像徵集於靈臺縣西屯鄉，毗鄰關中，長期受到關中文化的輻射影響，屬於同一文化區域。這兩件造像的一致性還體現在二者特殊的造像形式上，無論是五佛造像還是九佛造像，實質上都是由多尊小型禪定坐佛像組成的片狀多佛造像²⁷。

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件類似的片狀多佛造像，由兩身相同的禪定坐佛像和一身飛天像組成，《中國金銅佛》一書將其編為 6 號

²⁷ 張利明、魏文斌《北魏中期關隴地區小型金銅佛教造像研究——兼談成任東漢墓出土金銅佛像》，《文物》待刊。



圖 16: 故宮博物院 6 號像
(採自李靜傑主編《中國金銅佛》，第 24 頁，圖版 6)



圖 17: 天水博物館藏雙足短榻式背屏五佛造像
(天水市博物館提供)

像²⁸ (圖 16)。該像通高 6.7 釐米，禪定坐佛像單尊高約 4.9 釐米，與上述兩件片狀多佛造像的佛像尺寸相同；而且佛像各部分的特徵、背屏的形狀與裝飾紋樣也與上述兩像極為相近。佛像背屏上裝飾的帶狀聯珠紋是關隴地區金銅佛教造像中普遍流行的裝飾紋樣，鮮見於其他地區的小型金銅佛像上²⁹。這件造像早年購藏而來，但未注明購藏地點，考慮到同書公佈的小型金銅佛像中有一批購於西安，此像極有可能也是來自西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上述三件片狀造像製造和流行的地域相近，年代也相當，可以歸為同一類造像。

在造像題材上，與關中毗鄰的古秦州地區也發現了帶有五佛組合的小型金銅佛像遺存。天水市博物館收藏著一件雙足短榻式佛座的禪定金銅佛像，其背屏上鑄有五身坐佛³⁰ (圖 17)，同樣的佛像在私人收藏家手中也有不少。天水市博物館這件佛像與成任村五佛造像上五佛組合的一致性並非偶然，關於這一點，可以通過與關中秦隴地區九佛組合的類比得到確認。天水市博物館除了這件背屏鑄有五佛的佛像外，還收藏有一件背屏鑄有九佛的同類禪定金銅佛像。這種鑄有九佛組合的禪定金銅佛像數量很多，在西安、鎮原、固原等地皆有出土³¹ (圖 18)，還有不少流散於海內外公私收藏中³²。上文業已說明靈臺九佛造像與成任村五佛造像也屬於同類造像。可以看到，在片狀多佛造像和雙足短榻式佛座

²⁸ 前揭李靜傑主編《中國金銅佛》，第 24 頁，圖版 6。

²⁹ 張利明、魏文斌《北魏中期關隴地區小型金銅佛教造像研究——兼談成任村東漢墓出土金銅佛像》，《文物》待刊。

³⁰ 浙江省博物館編《佛影靈奇：十六國至五代佛教金銅造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年，第 75 頁。

³¹ 翟春玲《西安出土北魏銅佛造像研究》，《文博》2003 年第 5 期，第 46-47 頁；魏文斌、吳莊《甘肅鎮原縣博物館藏北魏青銅造像及有關問題》，《敦煌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16-21 頁；固原縣文物站《固原縣新集公社出土一批北魏佛教造像》，《考古與文物》1984 年第 6 期，第 35 頁。

³² 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圖版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年，第 55-59 頁。



a.天水市博物館藏

b.西安蓮湖區出土

c.鎮原縣城關鎮徵集

d.彭陽縣新集鄉出土

圖 18: 關中秦隴地區雙足短榻式背屏九佛造像 (筆者製作)
(a、b、c. 採自浙江省博物館編《佛影靈奇: 十六國至五代佛教金銅造像》, 圖版 35、34、37; d. 筆者拍攝)

禪定像這兩類關中秦隴地區特有的造像上，都出現了五佛與九佛的組合，說明這兩類造像在佛像組合方面有著明顯的呼應關係。

通過對成任村五佛造像之佛像樣式、尺寸、產地、造像形式，以及造像題材的綜合分析比較，可以確定這種由高約 4.9 釐米左右的禪定金銅佛像組成的片狀多佛造像是關中秦隴地區某一時期內普遍流行的一類造像。

接下來討論這類片狀多佛金銅造像的製作和流行年代。《中國金銅佛》一書認為片狀二佛造像的年代在 5 世紀上半葉，但未作出詳細說明³³。陝甘地區還流行一類十分特殊的佛板造像，能夠為推定片狀多佛金銅造像的年代提供相對可靠的依據。現存的佛板造像共 5 件，其中 4 件都有紀年。1980 年西安市蓮湖區曾出土過一件太和七年（483）追遠寺眾僧等造金銅佛板，一般認為，這類造像流行於陝甘地區³⁴。收藏於日本的一件無紀年佛板造像的上緣鑄有兩身與片狀多佛造像上佛像形象相同的坐佛像³⁵（圖 19a），這件佛板造像的底端與支座之間以兩個完整的“C”形雙龍首銜鈕連接；在另一件有北魏延興四年（474）紀年的佛板造像上也殘存有銜鈕連接處的接茬³⁶。與之類似，靈臺縣片狀九佛造像兩側的佛像也是以類似的“C”形雙龍首銜鈕連接的（圖 19b）。此外，固原雷祖廟村北魏太和前期漆棺畫墓出土的銅鋪首銜環上也出現了類似的“C”雙龍首圖 3 像³⁷。龍的細部特徵非常一致，

³³ 前揭李靜傑主編《中國金銅佛》，第 24 頁。

³⁴ 李靜傑《北魏金銅佛板圖像所反映犍陀羅文化因素的東傳》，《故宮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5 期，第 27 頁；張聰《北魏銅鑄佛板考論》，《美術學研究》第 5 輯，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6 年，第 261 頁。

³⁵ 金中《海外及港臺藏歷代佛像珍品紀年圖鑒》，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99 頁。

³⁶ 李靜傑認為是蓮莖，詳見前揭李靜傑《北魏金銅佛板圖像所反映犍陀羅文化因素的東傳》，第 24-25 頁。

³⁷ 固原縣文物工作站《寧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 年第 6 期，第



圖 19: 無紀年佛板造像與九佛造像比較示意圖 (筆者製作)
(a. 採自金申編《海外及港臺藏歷代佛像珍品紀年圖鑒》，第 399 頁；b. 靈臺縣博物館提供)

比如口部、眼睛、耳朵、耳下鬚毛等，甚至身體上的線刻紋和聯珠紋也幾乎一致。這些因素可為推定靈臺九佛造像的年代提供更多依據。

李靜傑根據佛板形制的演變，認為上述無紀年佛板的年代早於延興四年 (474) 佛板，大概與和平元年 (460) 佛板年代相仿³⁸。退一步講，其年代在和平元年 (460) 與延興四年 (474) 之間應無大謬，至少不會晚於佛板造像中紀年最晚的太和七年 (483)。這個年代範圍也可以作為靈臺縣九佛造像的年代範圍。

另一方面，基於題材組合的對應關係，上文所述西安、鎮原、

47 頁。該墓的年代與雲岡第 9、10 雙窟的年代接近，在太和十年 (486) 左右。詳細論證見寧夏固原博物館《固原北魏墓漆棺畫》，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4-15 頁。

³⁸ 前揭李靜傑《北魏金銅佛板圖像所反映犍陀羅文化因素的東傳》，第 24 頁。

固原等地出土的背屏上鑄有九佛的禪定坐佛像也可以為判定片狀多佛金銅造像的年代提供依據。根據魏文斌等人的研究，這類禪定坐佛像流行於北魏孝文帝遷都之前的太和年間，與雲岡二期的時代相當³⁹；松原三郎也認為在 475 年前後⁴⁰。

綜合上述年代分析，可以將關中秦隴地區片狀多佛金銅造像的製作年代推定在北魏孝文帝延興至太和初期（約 471-484 年）。成任村五佛造像作為眾多同類造像中的一例，應該也製作於這一時期。

四、結論

咸陽成任村 M3015 出土的這兩件小型金銅佛像並不特殊，無論是具體的造像特徵還是組合形式，抑或是造像題材都可以在十六國晚期至北魏中期關中秦隴地區流行的小型金銅佛像中找到大量相同的例證。這兩件佛像不是該墓原始的隨葬品，而是在後期被混入墓室的。至於混入墓葬的具體時間、過程和動機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這個問題目前祇能依據邏輯推理，並沒有實質性的證據，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難以達成共識。這兩件佛像的製造和流行年代並不相同，立佛像約製造於 5 世紀上半葉的十六國末期（約 420-439 年），片狀五佛造像約製造於北魏孝文帝延興至太和初期（約 471-484 年）。片狀五佛造像的年代較晚，其年代可以作為這兩件佛像進入墓葬的年代上限，即這兩件佛像進入墓葬的時間不會早於北魏孝文帝時期。

³⁹ 前揭魏文斌、吳莊《甘肅鎮原縣博物館藏北魏青銅造像及有關問題》，第 16-21 頁。

⁴⁰ 松原三郎著，陳名譯《中國早期金銅佛的一種考察》，《中國美術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46 頁。原文見松原三郎《中國初期金銅仏の一考察》，收入松原三郎《中國佛教彫刻史論（文本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年，第 11-19 頁。